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902012

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政治变迁

——以余江血吸虫病防治为中心

万 心¹, 万振凡²

(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2.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1958 年余江县在全国率先消灭血吸虫病, 树立了全国“第一面血防红旗”, 创造了世界血防奇迹。作为地域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血防对余江县域政治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表明: 高层领导对血防持续不断的关注和督促, 为余江血防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政治压力和政治变迁动力; 历届县委、县政府都把血防作为“一把手工程”, 视为“最大的政治”, 使余江县域政治带有浓厚的“血防”色彩; 县党政机构也发生相应变化, 完成了血防领导机构的常规化和党政机构的血防化; 余江是我国出台血防政令最多的县份之一, 血防在余江县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血防塑造了余江地域政治特色, 它使得余江县域政治带有明显的血防化特征。

关键词:血防; 政治变迁; 余江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5092(2019)02 - 0068 - 08

疾病对地域政治发展变迁的重大影响早已引起了海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英国史学家卡特赖特在《疾病改变历史》一书中, 就疾病对世界政治制度变迁作用进行考察, 提出疾病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国内关注疾病与政治关系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两位。一是杨念群, 他在《再造“病人”》一书中提出: 近代以来中国人贫弱的身体其实隐喻中国国家的衰败, “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 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他详细考察了西方医疗卫生机制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运作机制。二是胡宜, 他在《疾病、政治与国家建设》一文中, 从疾病的政治隐喻出发, 通过对“废止中医”“爱国卫生运动”及“合作医疗”等事件的叙述与解读, 对疾病如何被政治化进行了分析。限于全球和全国的研究视野, 上述成果缺少疾病与县域政治变迁关系的微观关注。近 20 年关于区域疾病史的研究成果则大都聚焦疾病及其防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对疾病与区域

政治变迁的关系却较少涉及。

1950 年代, 面对严重的血吸虫病疫情,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余江县于 1958 年率先在全国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 树立了“全国血防第一面红旗”, 并取得了近 60 年无血吸虫病反弹的辉煌成绩, 创造了世界血防奇迹。作为地方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使得余江县域政治带有明显的血防化特征。本文拟以建国以来余江血防为个案, 对疾病防控与地域政治变迁关系做一探讨, 剖析血防背景下余江地域政治“血防化”特征生成及演进过程, 旨在进一步推进我国疾病政治史研究, 并为当前的血防工作提供某些借鉴。

一、政治压力: 来自上级领导的持续关注 and 督促

民国年间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数省严重流行, 约有一千万人患病。^[1]血吸虫病给疫区人民带来了惨重灾难, 以江西省余江县为例, 从 1919

收稿日期: 2018-12-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CZS065); 江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7LS03)
作者简介: 万心(1986—), 女, 江西南昌人, 讲师, 博士生,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

年到1949年,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2]江西省委血防五人小组组长方志纯当时就指出,“这一种慢性病的死亡率很大,如任其发展下去,可以说有亡国灭种的危险”^[3]^[74],他指出:这种疾病之所以能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使人民经济困难无力治疗有直接关系。今天人民掌握政权,我们就决不能对此袖手旁观,要用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做好这一工作。^[4]时任余江县委书记的李俊久说:消灭血吸虫病是疫区人民多少年的夙愿。^[5]如果新政权消灭了血吸虫病,这就证明新政权优于旧政权,新政权为人民谋利益的形象就能稳固地树立起来,就能与以前置民众生死于不顾的反动政府形成鲜明对照。可见,党和政府把血防视为新政权合法性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主要运用“开新填旧”的灭螺方法,通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1958年5月12日至27日,由全国血吸虫研究委员会委员成员孙振中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鉴定组对余江血防全面复查鉴定,证实“余江县血防工作不论在消灭钉螺,治疗病人,粪便管理方面,都完全超过了中央制定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并为余江县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6]^[10]。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诗二首。^[7]

毛主席在诗后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生命而言,远强于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这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以外,现在1000万人患疫,1万万人受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7]当年血吸虫病不仅在我国有分布,在日本、菲律宾、印度、埃及、南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流行,许多国家都曾集中过力量开展防治,但都未能消灭血吸虫病。余江率先取得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根除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世界血防奇迹,在世界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毛主席对余江血防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送瘟神》诗二首的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使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余江县,成了家喻户晓的世界“血防圣地”。

一般的历史事件,发生过后会逐渐淡出人们记忆。由于血吸虫病在历史上给人类造成过深重的灾难,且难以根除,在全国各地不时反弹,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我国完成消除血吸虫病的任务还很艰巨”^[8],而余江是全国第一个根除血吸虫病且从未出现过反弹的县份,因此余江血防成为各级领导持续关注的“政治事件”。

首先是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余江县的血防工作。1958年毛泽东《送瘟神》诗二首,使名不见经传的余江县,成为中国血防的第一面红旗。为了保证毛主席树立的“第一面血防红旗”始终不倒,此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余江血防都十分关注。1978年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为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20周年题词“加强领导,依靠群众,为实现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遗愿而奋斗”。^[6]^[10]1984年,邓小平同志做出了“防治地方病,为人民造福”的重要批示。^[9]1989年12月11日,江泽民在《给湖区五省血防工作会议的信》中赞扬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成就,强调“抓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10]2004年5月,胡锦涛同志就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做出重要批示,指示“各级党委、政府务必……确保有效控制血吸虫病流行目标的实现”。^[11]这充分体现了高层领导对余江县血防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其次是余江县成为国家卫生部领导关注的焦点。1958年2月7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批转了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呈报的《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自从中央提出消灭血吸虫病以来,不到两年,这个县就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也证明了血吸虫病完全可以消灭,可以尽早尽快地消灭。……是防治战线上的先锋,为我们树立了战胜血吸虫病的先进旗帜”^[3]^[64],对余江血防工作给予充分肯定。1958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贺电中说:欣悉你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使全县人民永远摆脱了血吸虫病的危害,特向你县全体人民热烈祝贺。你县在与血吸虫病做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各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树立了榜样。希望你们总结发扬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进一步发动群众,做好除四害讲卫生,并在消灭其他危害人民的疾病上,取得更大的胜利。^[3]^[13]此后,历任卫生部的领导都要来余江调研血防工作。^[12]^[240]余江血防也受到了江西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关注。

仅2002年到2009年来余江县指导工作的江西省主要领导就有七人次。^{[12]240} 当全国出现血吸虫病反弹,国家在要制定重大血防政策时也会首先想到余江,全国许多重要的血防会议都会选择在江西或余江召开。如1989年12月13日,国务院在南昌召开“湖区五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卫生部长陈敏章以及血防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局有关同志。^{[12]289} 再如2006年5月23日上午,国务院在余江县召开全国血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血防领导小组组长吴仪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省委书记孟建柱、省长黄智权、农业部长杜青林和血防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局主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负责同志共约160人出席了会议。^[13] 全国性的血防工作会议,之所以要选择在余江县召开,显示出中央和全国对余江县血防成就的高度肯定和对余江县人民的政治信任。

显然,正是因为血防,余江才持续地被高层领导关注,没有血防,余江县在全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待遇”。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和督促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不仅使得余江县必须“力保红旗不倒”,而且在各级领导持续的督促、推动之下,余江血防工作不得不持续地走在全国各地前列。由于出色的血防工作,余江“血防圣地”的地位得以确立,血防为余江赢得了极高的政治声誉。许多人在血防工作中建功立业,受到了各种邀请和表彰,产生了一批政治明星,许多人因此得到升迁,血防增加了余江人的政治资源。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和督促,增强了血防在余江地域社会中的政治分量,使余江县域政治的“血防”色彩得以形成且长期保留。

二、“一把手工程”: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政治账”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上级领导持续关注、督促之下,余江县自始至终都把血防作为“一把手工程”。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上阵,亲自组织动员,亲自制定方案,亲自召集会议,亲自推进工作,避免了工作上的推诿扯皮、有令不行有令不止的现象,确保了上级领导交付的政治任务落到实处。

1957年江西省委在有关文件中指出:“各级

党、政都必须重视这一工作,坚决向这种疾病进行斗争,特别是流行地区,无论地、县、区、乡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争取在几年内达到完全消灭的目的。这项工作应作为对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好坏的一种表现来考察干部”。^{[4]46} 血防被视为重要政治任务,血防工作的好坏成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

在“送瘟神运动”期间,各级主要领导都把血防看成是最大的政治任务,不仅高度重视面上的工作,而且深入一线指挥作战。方志纯同志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任江西省委书记,一直亲自挂帅抓血防工作,他亲自坐镇余江,就近指挥作战。^{[14]8} 一九五六年初,李俊九担任余江县委书记,不久任县委血防五人小组组长,为了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他将县委血防五人小组办公室从当时远离疫区的县城锦江镇,搬到疫区中心邓埠镇,与血防站合署办公,实行战地指挥。李俊九领导了规模壮阔、声势浩大的全县“开新填旧”灭螺战。经过苦战,取得了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15] 平定公社书记张新安同志,在灭螺战斗中充当“排头兵”,他始终站在灭螺战斗的最前线,他领导的民工队组,总是能首先完成任务,成为该乡消灭钉螺的标兵队组。^{[3]151} 从省、县、乡的党委书记都亲自抓紧血防来看,血防无疑是“一把手工程”,这表明党和政府已把血防视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这种情况在宣布消灭血吸虫病后,一直延续下来。巩固血防成果成了余江县历届党委、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1958年宣布消灭血吸虫病后,余江也曾出现过放松血防工作的苗头。当时有人说:消灭了血吸虫病,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外地调来的血防干部也说,现在该收兵了,让我们回省城;疫区大多数农民认为,现在病好了,血吸虫病绝迹了,粪便管理可以不搞了;有的乡村干部说“血吸虫病消灭了,巩固工作不必搞了”。^{[16]134} 总之认为万事大吉,高枕无忧。县委经常通过各种会议形式,向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反复强调:“做好这一工作不仅是为了保障疫区人民的身体健康,而且具有特殊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因此,巩固工作只准做好不准做坏”。^{[16]134} 事实说明余江县委、县政府“不放松”的做法,对巩固血防成果起到了关键作用。1959年11月,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计云棠接到密报:在邓埠水稻原种场等地发现钉螺9只,有螺面积558平方米。^{[12]182} 计云棠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当

即指出:余江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全国第一面血防红旗,如果余江在宣布消灭血吸虫病后再出现钉螺甚至出现血吸虫病人,那无疑是给第一面血防红旗抹黑,怎么对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他一方面及时主持召开县委会,重申“长期观察、定期复查、反复斗争、巩固胜利”的方针,及时做出了4项决定:一是思想不松;二是机构不撤;三是队伍不散;四是经费不减。^{[12]186}在逐级向上级汇报情况的同时,余江县委及时组织灭螺人员对558平方米的有螺地面进行了严格的灭螺处理。

原余江县委书记孙永久在回忆文章中说:他接任余江县委书记之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此前,上饶地委第一书记彭协中找他谈话,要他去余江县委工作,叮嘱他说:“余江县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毛主席亲自写了《送瘟神》二首。你去那里工作,一定要把巩固血防成果的工作做好,这是政治任务,只准做好,不准出问题,如果出了问题,首先要找你负责。”^{[14]102}孙永久回忆说:“我受命来到余江之后,第一次下乡就到驻在邓埠镇的县血防站和以邓埠为中心的附近各疫区乡村了解情况。我发现,从县委到疫区的基层组织,从行政干部、业务干部到广大群众,都正在为巩固消灭血吸虫病的成果而积极工作”。^{[14]102}

1983—1988年黄俊任余江县委书记五年,他曾表示在他的任期内,决不允许血吸虫病反弹,他要求县委:“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为第一面红旗增光”。每年他都要召开几次血防会议,都要下到乡村考察实情,布置血防工作。在他的工作笔记本中,写满了有关血防工作体会、计划、经验总结等。其中一段写道:前20年,只是局限于灭螺,查治病,现在应重点开展综合监测。一是低年龄组人群监测;二是畜情监测;三是野鼠监测;四是疫水监测;五是粪窖虫卵监测;六是螺情监测;七是疫情输入监测。应该说这几条措施构成了一套巩固血防成果的科学办法。1988年他升任鹰潭市委书记,接替他的是钟义忠,在由鹰潭市委书记叶春主持的交接会议上,钟义忠当即写下军令状:“发扬余江历任县委书记的优良传统,和县委一班人同心同德,依靠人民群众,竭尽全力,擎起第一面血防红旗”。^{[12]292}

消灭血吸虫病以后,余江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巩固血防成果,防止血吸虫病反复作为事关群众利益的大事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做到思想不松

懈,防患于未然。早在1958年10月,余江县就发出第一份关于巩固血防成果的文件,提出“长期观察、定期复察、反复斗争、巩固胜利”的十六字方针。在巩固血防成果的过程中,余江县始终做到领导带头抓血防。从消灭血吸虫病到现在,余江县主要领导换了十几任,各个时期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也有所不同,但血防工作一直被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1988年以前余江血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多由县委或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他们在到任和调离时,都要把巩固血防成果作为县委、县政府交接班的重要内容。1988年以后,尽管由副县长主抓血防工作,但历届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依然把血防牢牢地记在心上,依然把血防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来抓。2006年75岁的原余江县委书记桂长贵说:“余江每任县委书记都比其他县的书记多一本账,就是巩固血防成果这本‘政治账’”。^[17]血防一直是余江县域社会一把手主抓的首要的“政治工程”。

三、血防机构的常规化与党政机构的血防化

为了确保“一把手工程”顺利实施,余江地方党、政机构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余江县不仅自上而下建立了各级血防领导机构,组成了一张抵御瘟神的严密防控网络,而且逐步实现了血防机构的常规化和党政机构的血防化。

1955年11月23日,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九人小组”在上海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1955年12月,遵照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的指示,中共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成立,由方志纯同志为组长,是为江西省血防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18]

余江县的血防领导机构,成立的时间还要早。1953年12月,马岗乡上黄村就成立了“上黄村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乡长张来生任主任委员,村长黄余才任副主任委员。^{[6]41}这是余江县成立的第一个基层血防领导机构。1955年4月8日,余江县人民政府成立县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由县委和卫生、农水、民政及疫区各区场的行政负责人共11人组成,县长陈近好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和秘书组、计划实施组、宣传教育组。^{[6]36}

1956年1月21日,余江县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余江县委血防五人小组”,由县委委员、副

县长吴早孙任组长。1 月 26 日,调整“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成员,由吴早孙和宣传、农业、卫生、血防、妇联、青年团等部门主要领导共七人组成。两机构下设统一的办公室,即县委血防办公室,配备一名专职副主任和两名工作人员,并于 2 月 16 日从锦江镇搬到邓埠镇,同血防站合署办公。疫区的三个区和两个农场,在党内也成立了血防三人小组,行政上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

1956 年 10 月 15 日,县委调整了血防小组五人员成员,由县委宣传部长刘先才任组长,县委决定刘先才长期驻邓埠镇,负责抓疫区的血防工作。1957 年 3 月 18 日,县委遵照党中央的要求,再次调整了县委血防五人小组成员,由县委书记李俊九任组长,刘先才任副组长,继续驻邓埠镇。调整后的县委血防五人小组成员,经中共江西省委(57)委字第 101 号文件批复同意。^{[6]36}

到 1957 年,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的 6 个乡镇均成立了党血防领导小组和政府的血防委员会。6 个乡镇有 3 个乡镇是党支书领导,3 个乡镇是乡长领导,两个农场是由场长或副场长领导,并大力吸收农业、水利、交通等部门的力量参加,整合了各医院和社会医疗资源,成立了各种专业试验组、防治组。乡以下的大队和生产队,也都设立了相应血防领导机构,将防治血吸虫病提到了各类疾病防治工作的首位。普通群众中则成立灭螺队、查病队,设立粪管员、卫生员、群众血防突击队等。至此,从中央到省、县、乡、村各级血防组织都建立起来,一张严密的血吸虫病的防控网络迅速在疫区建立起来,并紧紧依靠这一组织网络,完成血防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其他地方血防领导机构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领导机构,自 1960 年开始,全国各地血防工作开始放松,大多数省、县撤销了血防领导机构,遣散了血防人员。1986 年后,中央血防机构撤销。据权威人士 2004 年调查:从全国来看,“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已基本崩溃,基层血防队伍打散了,在湘、鄂、赣省村一级的单位,已经找不到一个像样的灭螺队来。血防的全面放弃意味着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血防已经不设防了”。^[19]另有材料指出:自 1998 年以来,全国血防工作会议仅召开了两次,中央对血防工作的检查、协调和督导力度大大减弱,用于血防工作的资金也是捉襟见肘,1992—

2001 疫区群众为查螺灭螺投工投劳极少,即使到 21 世纪初,全国各级财政对血防的投入每年不超过 7000 万元,^[20]经费短缺制约了灭螺、两管等工作的开展。由于血防专业人员常年生活、工作在基层和农村,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方面由于待遇低、工资得不到保障等原因,一些优秀血防人才流失,造成防治专业人员青黄不接;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开展防治工作的经费,在政府的补助不到位的情况下,血防机构采取“以副养主、以治补防”的办法增加收入,极大地影响了防治工作效率。

与此相反,几十年来,余江县始终把巩固血防成果作为事关群众利益的大事来抓,各级政府坚持“思想不松、机构不撤、队伍不散、工作不停”的方针,不仅没有撤销血防领导机构,反而大力加强血防领导机构建设。县血防领导机构演变情况见表 1^{[3]144-149}。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余江县自 1958 年消灭血吸虫病之后,长期将血防领导机构设为县委县政府的一个常设机构。第二,从 1958 至 1986 年县血防领导机构多由县委书记或县长任组长,由副县长、副书记或常委宣传部长任副组长,即使到 1988 年以后仍由副县长任组长,多名县委委员和政府领导参加血防领导小组。余江县委、县政府组成人员同血防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大部分重叠,他们往往一身二任。血防领导机构这种人员配置,说明血防是余江县党政机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史料显示,余江县委、县政府会议大多都会讨论血防问题,每年还要召开四次专题会议研究血防工作,各公社(场)党委一般一个季度专题研究一次血防巩固工作,余江县每年的 1 号文件都是关于血防工作的文件。^{[6]149-151}以上表明,余江县党政机构具有明显的“血防色彩”。

四、县政中心工作:血防政令密集发布

余江县是我国出台血防政令最多的县份之一,几乎每年都有有关血防工作的政令出台。这表明长期以来血防一直是余江县政的中心工作。

1955 年余江县人民委员会制定《关于防治消灭血吸虫病计划方案》,提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保护劳动人民健康,我们要在这些地区有计划和有步骤地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预计至一九五七年为止,全面根除血吸虫病对健康和生产的危害”。文件具体地制定了血防工作的防治要求、工作步骤、工作重点等,指出“所

表 1 余江县血防领导机构演变情况

时间	机构名称	组成 人数	负责人			
			正职		副职	
			姓名	党政职务	姓名	党政职务
1958	中共余江县除七害灭六病指挥部	18	李俊九	县委书记	陈近好	县长
1963	中共余江县 委血防五人小组	5	孙永久	县委第一书记	刘先才	县委宣传部长
1963	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	15	陈金水	县长	刘先才	县委宣传部长
1963	中共余江县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	9	孙永久	县委第一书记	吴早孙	副县长
1970	余江县血防领导小组	5	童金才	县革委副主任	郑根才	县委副书记
1973	中共余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		计云常	县委书记	杨金城	县委副书记
1974	中共余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	9	王景荣	县委 书记	郑根才	县委副书记
1978	中共余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	13	桂长贵	县委 书记	吴水林	县委副书记
1981	中共余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	13	桂长贵	县委 书记	周来春	县委副书记
1984	中共余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	11	桂长贵	县委 书记	祝钻坚	县委副书记
1985	中共余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	13	黄 俊	县委书记	艾佛胜	副县长
1986	中共余江县委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	11	吴伏生	县委副书记	周根昌	副县长
1988	县人民政府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	9	周根昌	副县长	万圻	卫生局长
1991	县人民政府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	9	张周庭	副县长	万圻	卫生局长
1992	人民政府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	9	聂赣良	副县长	万圻	卫生局长
1995	县人民政府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	11	李江华	副县长	张彩菊	卫生局长
2001	县人民政府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	12	蔡 江	副县长	张彩菊	卫生局长
2004	县人民政府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站	11	李中华	副县长	赵军荣	卫生局长
2009	县人民政府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站	12	万挺春	副县长	舒育兴	卫生局长

在区委、乡镇干部必须加强领导,大力支持,指派专人负责,具体领导,发动群众,做好宣传动员,严格遵守防治工作的要求。此外,卫生队及防治专业人员必须从关心群众健康出发,认真负责做好技术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有利条件”。^[21]

1956 年中共余江县委血防五人小组又制定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规划》,提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和县委提出的‘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要求,我县必须贯彻以生产为中心,血防为重点的原则,必须在两年内,把血吸虫病全部消灭,即五六年进行战斗,五七年彻底消灭血吸虫病。”^[21]《规划》对消灭钉螺、粪便管理、水源管理、治疗工作的任务与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1957 年县委血防办出台《余江县一九五七年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初步计划》,^[21]提出 1957 年我县防治任务仍很繁重,必须认真完成一九五七年计划。《计划》规定灭螺首先从村庄附近地区,威胁性大的地方做起,然后向外推进,并须经常运用有效方法,来改变钉螺栖息环境,使之不再成为钉螺滋生地,以巩固灭螺效果。两管工作要对去年的厕所、粪缸加以修补,应全部有棚有盖,不漏不

破,既要合乎规格又要便利使用。水源管理则继续实施沟塘分塘、分段使用、固定洗马桶塘与耕牛洗澡塘等措施。在治疗病人方面,全县约有 900 个病人在本年内要全部治愈。1957 年计划在县委的领导下,得以全面落实,这为 1958 年消灭血吸虫病奠定了基础。

余江县在 1958 年 5 月消灭血吸虫病以后,依然经常出台关于做好血防工作的指示、规定等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出台,使余江县血防工作走向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据有关资料,1958 年消灭血吸虫病后到 2009 年,余江县颁布的有关血防的地方性法规共有 76 件之多。^{[3]144-149}下面我们选取不同时期的三个文件略做分析。

1. 1958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发布《关于巩固我县根除血吸虫病成果的指示》。^{[16]113}指示指出:毛主席写的歌颂余江县人民根除血吸虫病的诗章“送瘟神诗二首”发表后,给余江县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我们应当再接再厉,决心用更大的成绩回答领袖的关怀。为了巩固我县的根除血吸虫病的工作,把瘟神全部连根送走,在已根除血吸虫病的四个乡、一个镇、二个农场,目前的任务是:第一,少

数已发现钉螺的沟、塘、水田地方,积极采取措施,充分发动妇女,适当抽出一部分劳动力,及时扑灭,严密检查,不让一个钉螺漏网。第二,全面来一次粪便普查,不分性别、年龄,每人送粪便三次,按时送完,由血防干部负责镜检。第三,凡检查到有血吸虫病的人,应就地集中治疗、不得借故推辞。这是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后发出的第一份巩固血防成果的文件。它规定了今后一段时间内余江血防的目的和任务,以行政文件的形式,要求“以上任务,希各疫区乡、镇、人民公社及农场,认真贯彻执行”,从而保证了血防工作的权威性,使巩固血防成果工作能够落到实处。

2. 1963年6月16日中共余江县委、余江县人委会联合发出《余江县血防巩固工作几项规定》。^{[3]77-78}文件指出:血吸虫病根除以后,必须做好巩固工作。今后必须继续坚持“长期观察、定期复查、反复斗争、巩固胜利”的原则,以达到永绝后患的目的。文件重点规定了巩固血防成果的十项工作。如以生产队为单位实行“四包一定”,即包查螺,包灭螺,包割草,定“奖惩”;建立查螺员队伍,每个生产队挑选一、二名查螺员,每年定期集中,由血防专业干部率领,全面复查钉螺1-2次;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建立查螺、灭螺登记卡制度,掌握系统的资料,以便掌握螺情的变化;分期分批对疫区五岁以上人口,不分性别、职业进行粪便检查,进行一年一次的全面普查;对疫区牲畜二年检查一次,发现病畜立即进行治疗;每个生产队设一名专职粪管员,严格控制新粪不下田;强化水源管理;实施渔民防护;加强血防科研;加强领导等。1965年的文件同1958年的相比,其重点在于血防巩固工作的具体措施,而不是任务和目的。文件规定的措施抓住了防制血吸虫病传播的几个关键环节:钉螺、查治病人、病畜、粪便和水源管理、渔民防护和组织领导等。以上几个环节,从理论上说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做到了位,都可以阻断血吸虫病传播。因此,文件提出的措施是科学合理的、可行的。余江县能够取得血吸虫病从不反弹的世界血防奇迹,与这些文件的颁布、落实息息相关。

3. 2007年3月3日余江县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巩固血防成果促进和谐发展的意见》。^{[3]89-90}这个文件的重点在于“法制血防”。文件出台的目的在于:要建立血防工作长效机制,切实巩固血防成果,坚决防止疫情反弹。文件明确提出:要坚持依

法科学防治,将血防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把血防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文件提出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不断完善血防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政府防治目标管理责任制,把血防工作纳入原疫区乡、镇、场的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将干部、群众、学生血防知识知晓率,改水、改厕,卫生环境整治以及血防工作制度落实等作为具体考核指标;继续完善血防工作“春查秋会”制度,对完成血防工作规划及开展血防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每年秋季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经验,研究解决血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以促进各项防治措施的落实;建立血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血防工作述职制度,各职能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血防工作的各项措施,并在年末向县“血防领导小组”述职;确定每年的4月30日为领导干部“查螺日”;充分发挥专业机构职能,健全血防专业机构工作责任制度,加强以螺情监测为核心的各项监测工作,完善医疗机构报病制度;将血防工作纳入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制定村规民约,继续实行有奖报螺、报病制度。这一文件表达了余江县人民政府力图将血防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的意愿,体现了新时代对血防工作的要求。

上述三个文件,大致可反映余江县不同历史时期发布的血防政令情况。这些政令既有长远规划,又有分年度计划,它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发出,在本县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确保了血防工作顺利开展。如前文所述,在不到60年的时间内,余江县颁布的有关血防的地方性法规共有76件之多,如此长期、密集颁布有关血防的地方性法规法令,其数量如此之多,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这充分说明血防在余江县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五、结论

从余江血防个案来看疾病防控与区域政治变迁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血防在政治任务、党政机构、行政内容等多方面对余江地域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血防第一面红旗”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捍卫这面红旗被视为余江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高层领导持续不断的关注和督促,为余江县完成血防这一严肃的政治任务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压力和动力。历届县委、县政府都把血防作为“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血

防,血防成为余江县域社会“最大的政治任务”。为确保“最大的政治任务”顺利完成,余江县委、县政府等组织机构也发生相应变化,完成了血防领导机构的常规化,党政机构带有浓厚的“血防化”色彩。余江县是我国出台血防政令最多的县份之一,几乎每年都有有关血防工作的政令出台,血防在余江县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总之,余江县在开展血防工作的过程中,血防也在形塑余江地域社会,它使得余江县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特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防控都能塑造地域社会政治特色。余江血防之所能成功塑造余江地方政治特色,是由余江血防所具有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些特点包括:第一,余江“全国第一面血防红旗”是由高层领导人亲自树立的,具有“名人效应”。这不仅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方力量必须力保红旗不倒,而且也使余江血防能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支持,尤其是余江本地社会的高度认

同。第二,余江血防具有重大影响。血吸虫病是对人类健康和生产危害极大的一种慢性寄生虫病,在世界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不仅在我国有分布,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流行。别的国家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没有做到消灭血吸虫病,余江做到了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事。作为世界和中国医学史上重大事件,必然要对当地社会产生影响。第三,余江血防具有长期坚持的特点,也就是说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进行了持续的冲击,不断强化余江地域政治血防特征。第四,余江血防具有群众运动特点,全民参与,上下一心,血防渗透到地方社会的各个角落和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五,余江血防具有制度化特点,无论是血防机构的常规化,血防措施的地方法律化,还是血防工作的中心地位等,都有利于固化余江地域政治血防特征。由于余江血防具有上述特点,最终将余江地域政治成功地打上了深深的“血防”烙印。

参考文献:

- [1] 程崇圯. 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的一页[N]. 江西日报, 1958-05-31(01).
- [2] 《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 纪事·2007[Z].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268.
- [3] 余江县送瘟神纪念馆. 余江县送瘟神纪实[Z]. 2012.
- [4]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江西党史资料——江西血吸虫病防治: 第37辑[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 [5] 杜兴. 余江: 红旗上天血吸虫入地[J]. 时代教育, 2008(12): 56-57.
- [6] 余江县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站. 余江血地防志(1953-2010)[Z]. 2011.
- [7] 毛泽东. 送瘟神二首[N]. 人民日报, 1958-10-03(01).
- [8] 李克强. 完成消除血吸虫病的任务还很艰巨. 新华网, 2014-11-22.
- [9] 编辑部. 邓小平, 陈云, 赵紫阳为地方病防治工作题词[J]. 中国公共卫生, 1985(1): 1.
- [10]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江西血吸虫病防治: 30辑[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254.
- [11] 陶丽琴. 确保控制血吸虫病目标实现[N]. 中国水利报, 2004-06-10(02).
- [12] 邹华义. 跨越死亡地带[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 [13] 郭家钢. 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江西省召开[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6(4): 220.
- [14] 孙永久. 巩成果迎难而上, 把血防红旗举得更高[C]//江西省政协. 江西文史资料.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 [15] 李俊九. 苦战两年胜千古, 人寿年丰传佳音[N]. 江西日报, 1958-06-01(01).
- [16] 刘先才. 在全县血防巩固工作专业会议上讲话[C]//余江县血防文件选编(1950-2011). 余江: 余江县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站, 2012.
- [17] 江仲俞. 春日余江柳色新[N]. 江西日报, 2006-05-22(03).
- [18] 江西省档案局. 鄱阳湖: 开发历史进程与生态建设(下)[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10: 616.
- [19] 赵世龙. 调查中国——新闻背后的故事[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338.
- [20] 孙秀艳. 血吸虫的现实及历史[N]. 人民日报, 2003-11-26(03).
- [21] 余江县血站档案室. 余江县档案资料汇编之二·送瘟神第二辑[B]. 南昌: 江西省档案馆馆藏, 档案号 111-2-343.